

中共延安時期文字獄：

王實味事件經過

年五月發表他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使鬭爭分外熱烈。

「政治家藝術家」一文

王實味事件發生到現在已整整四十年了，四十年來對中共的思想、政治、組織都有相當程度的影響。毛澤東差不多積四年處心積慮的準備，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終於在延安揭開了以黨內爲主的整風（學風、黨風、文風）運動。不久，逐漸蛻變成爲對中共內部的審幹、肅反運動，從而打擊了忠於中共的大批久經考驗的幹部。王實味事件便是這一次運動的祭旗典型。

王實味是一九二六年入黨的老黨員，爲了響應毛澤東的整風號召，乃起而議論紛紛。他先後於一九四二年二月、三月、四月三個月內相繼公開發表了震驚中共中央，「動搖人心」的三篇精短有力的煽動文字。這三篇文章思想一貫，暴露了延安這個共產主義小朝廷的骯髒與黑暗。毛一

看到王實味這一系列的大塊文章，就認爲整風運動中有奇兵奇蹟出現了。

這時後方各地均可發現「關於『野百合花』及其——延安文字獄真相」的小冊子，迫使中共要急速揭露王實味的托派老底，要批判他反對中共的理論，闡爭他的反黨活動。毛澤東司令部在延安搞理論的周揚、胡喬木、艾思奇、范文瀾、陳伯達、李維漢（羅邁）和張如心等人，都傾巢而出參加這一場歷時甚久的「文藝剿匪」（中共向稱托洛茨基派爲托匪）鬭爭。同時毛又在這

在南京結婚。⁽¹⁾

「野百合花」再放把火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在中共中央黨校發出整風號召後不久，延安「解放日報」上由丁玲、陳企霞主編的「文藝」副刊，於三月十三日及同月二十三日分兩期發表了王實味的這篇「野百合花」小品雜文，只短短四、五千字把延安共產主義的天堂眞相暴露無餘。王實味說：「舊中國的骯髒污穢也就沾染了我們自己，散布細菌，傳染疾病。」「要想在今天，把我們陣營裡一切黑暗消滅淨盡，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減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師』們不惟不會強調這一點，而且很少提到這一點。」王實味所說的「大師」就是他文中所指的那些「言必稱希臘」的大師，即是那些「言必稱列斯」、「言必稱國際」和「言必稱蘇聯」的中共大頭子、小頭子們。

延安畢竟還是後方，上層社會仍然是舊時社會，依然還是一片歌舞昇平。所以王實味很感嘆的說：「在這歌譜玉堂春、舞廻金蓮步的昇平氣象中，提到這樣的故事（按指文中所提李芬小姐被殺事），似乎不太和諧，但當前的現實——請閉上眼睛想一想罷，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

在血泊中倒下——似乎與這氣氛也不太和諧！」

當時在延安還有不少「外交團」駐紮在這個小朝廷的窯洞中，有第三國際代表團、中外記者團、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事代表團、中共兄弟黨代表團、美軍駐延安觀察組代表團，這個觀察組人員一九七八年五月還組成一個為數約二十人的訪問團，前往北京訪問。前任觀察組長威爾伯·皮特金及戰時美國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謝偉思也同去了。五月十九日葉劍英、聶榮臻等人還接見了他們。舞會也就有必要了。所以每逢星期六晚上，延安常有跳舞晚會。同時魯迅藝術學院平劇團的玉堂春，也常為一般公餘之暇，去晚會上找些必要的娛樂的人所喝采。

中共在生活、生產極端的艱苦中，又大搞生級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以維護中共大頭子、小頭子生命的安全。小小的老百姓對這些措施極為不滿，主張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由於生活上的這些奇異現象，他們精神上感到苦悶，感到窒息，似乎「生活裡缺少什麼」，牢騷滿腹。王的文章還說：「爲了民族的利益，我們並不願再算階級仇恨的舊賬。」這句話更觸犯了中共的大忌。共產黨是搞階級鬥爭起家的。

接著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編輯出版的「穀雨」第四期，就在四月十五日發表了王實味以「實味」筆名所寫的「政治家、藝術家」一文。這只是一篇含有寓意的短評，是普通的一般言談或諷刺文字。王實味並沒有指着誰的鼻子大聲叫罵和斥責，最多也是指桑罵槐。毛澤東他們在整風熱的時候，竟昏了頭腦，就連這一點寫作自由也不肯放過，要殘酷打擊這樣一位忠於

中共的老黨員。

這篇文章被批判為徹頭徹尾的反黨，以及指責在中共統治下的社會包括它的黨的組織，一片骯髒和黑暗。王實味在文中說：「『愈到東方，中國的革命戰士，也不能例外。』這就是說中共在中國搞了多年的馬列革命，連自己也要沾染上它們」，連自己「也不能例外」，如何能靠中共來改造社會呢！

王實味又說必須要找政治家來改造社會制度，消除骯髒和黑暗，還要請靈魂的工程師藝術家，來改造人的靈魂（心、精神、思想、意識）。「藝術家改造靈魂的工作，因也就更重要、更重要，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極的，因爲黑暗消滅，光明自然增長。」他的意思認爲中共組織中，缺乏這兩種人才，甚至根本就沒有。

十年文化大革命正可以證明王實味說的，不但「愈到東方，則社會愈黑暗」，愈入中共的組織才能了解這個組織的黑暗，和這個組織對待黨員、對待羣衆的殘酷與恐怖，豈止骯髒而已。十

年文化大革命的成就，實際上在毛澤東的旗幟下，王實味以「實味」筆名所寫的「政治家、藝術家」一文。這只是一篇含有寓意的短評，是普通的言談或諷刺文字。王實味並沒有指着誰的鼻子大聲叫罵和斥責，最多也是指桑罵槐。毛澤東在他的秘書胡喬木和王實味談過兩次話，給王寫過兩次信。胡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野百合花』的錯誤，首先是批評的立場問題，其次是具體

的意見，再次才是寫作的技術。毛主席所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這種錯誤的立場。那篇文章充滿了對於領導者的敵意，並挑起一般同志鳴鼓而攻之的情緒，這無論是政治家藝術家，只要是黨員，都是絕對不容許的。這樣的批評愈能團結一部份同志，則對黨愈是危險，愈有加以抵制之必要。」②胡喬木的苦心白費了，王實味仍然堅持他的看法和立場。

針對「野百合花」上的批評，毛澤東於四月一日利用博古（秦邦憲）主持「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的機會說：「關於整頓三風問題，各部門已開始熱烈討論，這是很好的現象。但也有些人是從不正確的立場說話的，這就是絕對平均的觀念和冷嘲暗箭的辦法。近來頗有些人要求絕對平均，但這是一種幻想，不能實現的。我們工作制度中確有許多缺點，應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絕對平均，則不但現在，將來也是辦不到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我們應該拒絕。」說到批評態度時，毛指出「批評應該是嚴正的尖銳的，但又應該是誠懇的、坦白的、與人爲善的。只有這種批評態度，才對團結有利，冷嘲暗箭，則是一種銷蝕劑，是對團結不利的。」③

當時在延安也有很多同情王實味的，說

王實味的第三篇大作是大字報，貼在中共中央研究院的牆壁上。研究院於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日起，停止一切日常研究工作十天，專門從各研究室主任做結論，再交由全院檢查委員會從事全盤檢查，由研究院副院長范文瀾、羅邁等人負責。中共中央研究院由原馬列學院改組而成。它的組織看來相當龐大，有國際研究室、新聞研究室、教育研究室、文化思想研究室、文藝研究室、中國經濟研究室、中國歷史研究室、中國政治研究室、俄文研究室等單位相當重要。

在討論整風問題時，各研究室人員發言均極熱烈，時有爭執。研究院為配合與會者的討論，特於三月二十三日出刊了壁報「矢與的」。第一期出了四大張，第二期又出了九大張，內容全為對研究院內部生活的批評與揭露，每日讀者川流不息。④生意興隆好像文革期間的大字報。

王實味老當亦壯，便於四月間在研究院「矢與的」牆報上，奮勇地寫下了「硬骨頭與軟骨病」的大字報公開發表，來檢討院內的生活。王實味很露骨地、大膽地提出他的硬骨頭理論，他說：「在這一次鬭爭中，我們必須首先檢查自己的骨頭，向自己發問：同志，你的骨頭有毛病沒有？」你是不是對『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話不敢說？要了解，軟骨病本身就是一種邪氣，我們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⑤這是王實味的思想動員令。研究王實味事件的人，對他在

那張壁報上的標題，一向認為是「硬骨頭與軟骨頭」，其實應該是「硬骨頭與軟骨病」才對。⑥

毛酋深夜挑燈往觀

毛當晚一聽說王實味又在研究院牆壁上，寫下了這篇生動、諷刺、煽動性的大字報很不放心。便深夜囑咐他的警衛員陪同，打着馬燈，從他的住處楊家嶺徒步前往，逐字逐句的拜讀，毛一看到王的大字報後連說：「王實味掛帥了，不是馬克思主義掛帥。」毛很興奮地回到洞府，就此小事大做，組織機關羣衆，有的放矢。王實味的羣衆還未覺醒，還未起來的時候，「王實味掛帥」祭旗的全面思想鬭爭和審幹工作已開始了。

中共中央研究院於五月二十七日開始了一連串批閱王實味的座談會。中共中央研究院黨委與王實味有過八次談話。研究院副院長范文瀾也與他談過二、三次。這個院黨委還選了王實味的好五人找他談話，「幫助他改正錯誤」。王說他沒有錯，所以自始就不發生改正錯誤的問題。

王實味於六月一日上午向中共中央研究院黨委提出退黨的要求，他說他一個人與黨的功利主義之間的矛盾是幾乎無法解決的。」他要走他「自己所要走的路」。王實味太天真了，中共當時還未完全脫離幫會組織的殘餘氣息和形態，怎麼可以隨便就能自由脫黨呢，第二天艾思奇在座談會上說王實味的立場，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的反動方面，是反動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他用走私的方法，散佈他的托派思想。

對王實味的鬭爭雖然進行了很久，但他拒絕出席這些座談會。六月四日他第一次出席了，却低沉地說：「我鄭重地嚴肅地撤消我前天（按即要求退黨）」。他的這次突變，是由幕後殘酷打擊出來的。關於他與中國托派的關係，他在這一天的座談會上曾說，他於一九二九年開始與托派來往，替托派翻譯過「列寧遺囑」、「托洛茨基自傳」兩章，還在托派刊物上發表過小說，與托派人士常有往來。王實味更進一步說：「我認爲托派對立三路線的批評是正確的。我看到了『八一宣言』，覺得這和托派國民會議的主張差不多。看到了魯迅答托派書，我才站到統一戰線的立場上來。」王實味所說的「八一宣言」，是王明在第三國際工作時，代表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起草的「爲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於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發表的，所以叫「八一宣言」。至於王實味還提到的魯迅答托派書，是指中共中央派與魯迅的聯絡人馮雪峰，於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以馮自己的筆名「O·V」代魯迅起草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

王實味曾將他與托派的關係，於一九四〇年報告中共中央組織部。王實味又在座談會上說，他於一九三六年自上海初到延安時，覺得到處受人歧視，他有幾個最大的敵人，陳伯達就是其中一個。一九四〇年王在民族形式問題上批評過陳伯達，也和他爭論過。陳伯達罵他是第二國際機會主義。「假如他再罵我是第四國際，那還得了麼？爲着站穩腳跟，我才把我與托派的關係報告

組織部。」他還大罵陳伯達是宗派主義。⑦
陳伯達於六月九日在研究院座談會上，針對王實味和王實味的問題，作了很長的發言，除痛斥王實味的托派思想理論基礎外，還說：「我從前在馬列學院（按即改組後的中共中央研究院）工作了一個時候，和他同一個黨的小組，只要他參加了小組會，這個會是一定沒有法子開下去的。」又說：「他在馬列學院也就用這種挑撥離間的手段的，他企圖拿這個反對那個，拿那個反對這個，散布謠言，製造混亂空氣。」「從前在馬列學院編輯部，他就是大鬧稿費的。又像大家所知道的，他拍桌子要吃小廚房，拍桌子要求幹部服。再如：當去年（按指一九四一年）馬列學院改組的時候，他提議文藝研究室不要有主任，但他後來却活動要當研究室主任。」⑧

所謂幹部服和非幹部服都是同樣的土布做的。

幹部服只是腰間多出兩條縫，穿起來略為合身些。一九四一年冬天，發棉衣時，王實味沒有領到幹部服，就在研究院裡從前山吵到後山，從山下鬧到山上。范副院長只好把他自己的幹部服送給老王，才算平息了這一場風波。據說王實味只要了一頂帽子護頭防冷，沒有要衣服。⑨王實味是一個有個性的人，又是一個喜愛真理爭自由平等的人。在這個鐵的紀律的環境下，思想和生活都是痛苦的。陳伯達指的這些，不全是王實味一個人所獨有，這正表示王實味不滿意毛澤東他們在馬列的號召下，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至於陳伯達說王實味「拿這個反對那個，拿那個反對這個」，中共中央比王實味的道法高明的人太多了。

組織部。」他還大罵陳伯達是宗派主義。⑦
陳伯達於六月九日在研究院座談會上，針對王實味和王實味的問題，作了很長的發言，除痛斥王實味的托派思想理論基礎外，還說：「我從前在馬列學院（按即改組後的中共中央研究院）工作了一個時候，和他同一個黨的小組，只要他參加了小組會，這個會是一定沒有法子開下去的。」又說：「他在馬列學院也就用這種挑撥離間的手段的，他企圖拿這個反對那個，拿那個反對這個，散布謠言，製造混亂空氣。」「從前在馬列學院編輯部，他就是大鬧稿費的。又像大家所知道的，他拍桌子要吃小廚房，拍桌子要求幹部服。再如：當去年（按指一九四一年）馬列學院改組的時候，他提議文藝研究室不要有主任，但他後來却活動要當研究室主任。」⑧

這位河南掌櫃的，算不得什麼。陳伯達後來在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任內的表現，其橫蠻、霸道、毒辣、殘酷，誰不為之側目，王實味算老幾。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設立特別法庭審判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十二月十八日審判被告陳伯達，陳組長在庭上不斷表示「認罪」。他的頭骨是硬的嗎？比王實味的如何。

王實味並對人表示「我的錯處，只有我自己能清算，別的人，不論哲學學得怎樣好，也不會弄清楚的。」由於王實味頑強地抗拒了來自各方面對他的攻擊，堅不承認錯誤。因此，中共中央沒有人員中共黨支部，一致要求開除王實味的黨籍。

殘酷鬥爭禍延丁玲

接着，延安文藝界於六月十五日至六月十八日假座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作家俱樂部舉行座談會，主要在討論王實味事件，特別要駁斥他的「政治家、藝術家」一文中的一些他們認為不正確的觀點。到會文藝作家四十餘人，由丁玲、周揚、塞克（音樂家）三人為主席團。

座談會還通過了「關於王實味事件的決議」：「（一）我們一致認為，王實味的根本思想是托派的思想，他根據這種思想而進行的這一種活動，是托派的活動，這是反對無產階級、危害共產黨和革命事業的，是一切革命者和革命的同情者所應堅決反對的；（二）我們一致認為，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藝術家』，正是他的這種錯誤思想的宣傳，而當時「解放日報」文藝欄和「野百合花」的作者四十年來沉冤不白，太虐待中共自

雨」未能加以揭露和批評，反而予以刊載，是不適當的；（三）我們一致認為，中央研究院和「解放日報」最近所進行的對王實味的清算和鬭爭，是正確的、必要的，對整個文藝界和我們自己都有很大的教育意義，所以我們共同一致擁護這個鬭爭。」

「解放日報」上的「文藝」副刊發表王實味的「野百合花」時，丁玲正是這個副刊的主編，能及時加以揭露和批評，反而予以刊載「放毒」，難辭其咎。陳企霞，浙江鄞縣人，三十年代在上海參加「左翼作家聯盟」，一九三四年後兩度被捕。一九四〇年從重慶到延安，第二年起自中共中央青年運動委員會調往「解放日報」協助丁玲工作。到了一九五七年毛澤東橫掃黨內外一切牛鬼蛇神，大量散發右派帽子的時候，丁玲與其她數十萬人頓時成爲右派，從人間入了地獄。毛澤東對丁玲似乎餘恨未息，一九五七年十月、一九五八年三月及同年五月多次在中共中央會議上指斥丁玲是共產黨反共，又說：「丁玲是暗藏在黨內的壞人，早已叛黨。」⑩姚文元也參加反右運動，於一九五八年在「明芽」第六期上，發表了「批判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內容談不上批判，只是一個小小啦啦隊助陣而已。

可憐的丁玲在文革期中，再因爲「野百合花」一案幫助托派反黨有功，構成中共叛徒的最佳罪證之一，何況她又是毛的欽犯呢。丁玲到了晚年才獲得平反，一九八一年夏天還到了資本主義國家美國訪問，重談無產階級的文學。而「野百合花」的作者四十年來沉冤不白，太虐待中共自

己的文藝創作者及從事文藝工作的人員了。

文字獄迄今未平反

點燃文革烈火的「海瑞罷官」、「海瑞罵皇帝」的作者吳晗的冤案已平反了，「三家村」的掌櫃鄧拓也昭雪了，黨內最大走資派、中國赫魯雪夫、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也恢復名譽了，「向毛主席下戰書」「瘋狂向黨內進攻」的彭德懷和彭、黃反黨集團不實之詞也推倒了。王實味的地位、功力、聲望，影響遠不如他們。鄧掌櫃他們都平反了，何必要把這位河南掌櫃冤到底，無法投胎轉世呢。中共就喜歡爲它自己製造很多未來歷史上的有名人物。

中共自三十年代起對小說、詩歌、戲劇、音樂這一類有關文藝的作品，黨內會不斷發生理論上不諧和的論爭，但還允許黨內文藝工作者有相當的寫作自由。自一九三五年元月起毛澤東奪取了中共的黨權及軍權後，逐漸開始搞天下烏乎定，定於一的工作——黨權、軍權、思想定於一。

一九四二年的整風和一九四三年的審幹完成了初步工作。一九四五年中共的七大毛澤東開始主席全黨，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老病含恨死去，才結束了爲期三十二年的中共個人專橫、個人獨裁的時代。中共政治雖然有了變化，但文藝仍一籌莫展，爭論時伏時起。

真正的文藝作品在表現一個時代大多數人民的思想和大多數人民的生活，以及這個社會中許多有影響人心的，如剝削、殺人、放火、強姦、搶刦、造反、奪權、蘇秦背劍、戴高子、坐

飛機等光怪陸離的現象，讓讀者自己去作一個客觀正確的批評。一九四二年五月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定了許多框框，完全爲黨工農兵題材太窄小了，完全爲那一個階級服務，更容易弄虛作假。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風流人物、流浪漢、地痞、流氓、娼妓、小足、鴉片鬼、軍閥、投機商、政客都可以作爲題材。人總是

喜愛自由，喜愛真理，喜愛真實的。
黑暗與光明難分難解。王實味的作品也只淡淡地指出延安的黑暗與骯髒，這不算是什麼大不敬、滔天大罪。世界上有人的地方就有黑暗與骯髒，正如世界到處也有光明一樣。中共何必把黑暗與骯髒視爲獨有。對王實味搞無產階級專政呢。人類應該有權過他們自己認爲的正常思想活動。一部二十四史那一個朝代不是被人民的新思想所推翻所毀滅的。中共如果一味堅持它自認的正確政策，則它自己從歷史經驗來看，應該知道自己的命運了。

延安撤退之時被殺

王實味頑強地抗拒中共對他的批鬥和加給他的托派罪名，絕不承認他對中共犯了什麼錯誤、什麼大罪。王實味爲真理受盡了中共的折磨。主張中共中央社會部的康生，堅持王實味仍然是托派，還進一步說王實味是藍衣社在延安的秘密務。

康生於一九四三年五月下令將王實味扣起來。毛澤東於一九六二年元月三十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才提到一九四七年三

月中共倉皇撤出延安的途中，王實味被中共保安機關秘密殺害了，還株連了一大批人。毛事後才知道，說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但不主張殺。

在整風運動中還有很多人默默地失蹤了，從此不知下落。

註：

①孟昭璣：「悲劇人物王實味」，中外雜誌

，一三六期，一九七八、六，七二一七七頁。

②范文瀾：「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一日座談會上的發言」，解放日報，一九四二、六、二十九，四版。

③「毛澤東同志號召整頓三風要利用報紙」，解放日報，一九四二、四、二，一版。

④「中央研究院討論整頓三風」，解放日報，一九四二、三、二十八，三版。

⑤張恕：「澈底粉碎王實味的托派理論及其反黨活動」，解放日報，一九四二、六、十七，四版。

⑥杜哲：「關於王實味的一篇文章的題目」，甘肅師大學報，四期，一九八〇、十二、二十一，六十七頁。

⑦溫濟澤：「鬪爭日記」（中央研究院座談會的日記），解放日報，一九四二、六、二十八；六、廿九，四版。

⑧陳伯達：「關於王實味」，解放日報，一九四二、六、十五，四版。

⑨榮孟源：「學習范文瀾同志」，紅旗飄飄，二十一集，一九八一，一七二頁。

⑩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第一次講話，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